

回顾与探索

袁博



2008.9.14

回顾与探索

荒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9369

8-0309

回 顾 与 探 索

荒 煤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307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13 定价：1.50元

DC55/60
目 录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	(1)
当前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22)
《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 ·····	(42)
解放思想 相信群众·····	(47)
惊雷一声迎新春·····	(53)
——看《于无声处》后的一点感想	
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	(60)
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96)
——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新侨会议的讲话	
请为青年作家打开闸门吧! ·····	(112)
——关于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通信	
关于总结三十年文艺问题·····	(117)
漫谈“作家熟悉的”和“百花齐放”·····	(143)
努力提高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水平·····	(149)
关于《报春花》的一封信·····	(155)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	(160)
谈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	(185)
把握时代精神 提高创作水平·····	(196)
——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而奋斗 ·····	(229)

努力办好新时期的文学期刊·····	(235)
——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文艺战线思想解放的丰硕成果·····	(243)
对生活的认识和探索·····	(251)
——《蒋子龙短篇小说集》序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260)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青年作家的希望·····	(281)
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历史教训·····	(298)
并非闲话,而是期望·····	(321)
迎接文艺的春天·····	(326)
理解作家、人民和时代·····	(337)
心灵的探索 时代的颂歌·····	(345)
——《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读后感	
谈谈农村题材的创作·····	(359)
杂谈鉴赏与批评·····	(377)
——《鉴赏集》序	
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383)
文学研究工作的新收获和新问题·····	(389)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年)前言	
不要忘了文学·····	(401)
——祝《电影剧作》复刊	
后记·····	(405)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

林彪、“四人帮”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是“黑线专政”，而且说，这个“黑线”的根子在三十年代，又粗又长，特别是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进行恶意的攻击，无限上纲，把这个口号说成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道道地地的国民党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

林彪、“四人帮”之所以如此疯狂地攻击和诬蔑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实质上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崇高评价的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成績，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什么“空白”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同志，根本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革命文艺路线，从而把叛徒江青打扮成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

其次，林彪、“四人帮”攻击三十年代和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矛头也主要是对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始终最忠实地捍卫和执行了党的文艺路线，无微不至地关怀文艺工作，才使得党的文艺事业得到很大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在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周恩来同志也就亲身直接领导了文艺工作，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动文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支伟大的力量。林彪、“四人帮”千方百计地诋毁周恩来同志在文

艺战线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甚至把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国民党地区和军队中活动的演剧队一律都打成“国民党的别动队”，其目的就是为了诬蔑周恩来同志，打倒周恩来同志。

林彪、“四人帮”把“五四”以来党所领导的一支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把一些久经锻炼的已经成为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大批老干部，以及这些领导骨干培养起来的新干部，统统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黑线人物、黑干将，甚至连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干部也都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其罪恶用心就是要从文化战线上打开缺口，进而把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统统诬蔑为“黑线专政”，实现“改朝换代”，复辟资本主义。

还应该特别指出，江青、张春桥对三十年代的文艺干部的十分仇恨，还有一个卑劣的阴谋，就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丑恶历史，企图“杀人灭口”。

以上事实说明，正确评价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是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下面，我着重谈谈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

—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蒋介石政府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主义的反动政策，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特别是经过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党中央；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斗

争及国内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成立“国防政府”，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际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并且强调指出：

中国伟大民族的生存，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的斗争中的统一中心，只有中国苏维埃才能统一和团结一切反帝势力，来进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接着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并且反复地批判了关门主义的“左”倾幼稚病，尖锐地指出：

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应该指出，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党的负责人周扬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认为这种文学“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真正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样意义的‘国防文学’就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

当时地下党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根本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和文件。骤然从外国报刊上看到“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看见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感到十分鼓舞。之后，又收到了“左联”派驻莫斯科的代表肖三的来信，批评了“左联”过去工作中的关门主义，指示解散“左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信中着重指出：“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于是，上海文化界地下党把“国防文学”当作当前的文艺运动的一个正式口号提了出来。

可见，“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是和党当时提出的基本策略，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相适应的，是和“国防政府”这个口号相配合的，也是一个号召文学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应“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

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并提出“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

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在文学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正是为了响应党的政治口号，也正是为了加强对文艺界在抗日运动中的政治领导。怎么能说这个口号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口号呢？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还继续指出：要实行“国防教育”，“新闻界、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为什么单单“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呢？

有人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有第三国际的影响，而第三国际号召成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有“右倾”思想的萌芽。并且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与意大利的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交出武装，换取资产阶级政府中职位，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就是这种右倾思想发展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也有人认为王明在共产国际大会的发言，也有右倾思想，在抗战之后又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就带有先天的右倾思想的烙印，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这种逻辑是错误的。从共产国际运动的全部历史来看，每当一个重要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一个总的战略意义的口号、策略，制定一条路线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时，在其执行的全过程中，全部工作中，在某些部门，某些地区中，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尖锐，由于某些部门、某个地区的领导人的斗争经验、理论水平不一，在执行这个总任务的过程中，即使在正确的路线下，也难免会发生“左”

的或右的倾向，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而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有时也就掩盖了另一种倾向。

事实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指出要“尽量加紧防备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广泛发展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会跟着增长起来的……就是降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队伍中的作用……”

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发言，迫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提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等，并且强调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但是他没有检查自己“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反而把四中全会及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自然，他当时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个错误，甚至在“七大”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之后，他也没有认识。

当然，王明的发言没有强调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增长，而且在抗战后，还对他的发言作了修改，增添了许多右倾观点和言论，特别是抗日初期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形成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终究不能不加具体分析，不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把掩盖着的右倾思想或萌芽状态的右倾思想，和逐渐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同起来。更不能笼统地把右倾的错误归罪于一个正确的口号，把正确的口号当作错误路线的产物。

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抗战之后，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形成的，已经是在“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的两年之后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则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才明确指出：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

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更明确指出：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

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才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

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看到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尔后才给予批评的。

怎么能够要求一九三五年上海地下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同时，就能预见以后会出现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怎么能够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给“国防文学”打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烙印呢？

因此，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和党的总策略，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形势是相适应的，是和政治上要求建立国防政府这个口号相适应的，是一个正确的革命的口号。不能说它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二

我们研究一切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否正确，也要联系实际来考虑。

如上所述，因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我们党在当时的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相适应，因此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获得很大的反响和拥护，很快地实现了郭沫若在《国防·污池·炼狱》一文中提出的愿望：“国防文学不妨扩大为国防文艺，把一切造型艺术、音乐、演剧、电影等都包括在里面。”在较短时间内，在全国文艺界迅速地发展为一个蓬蓬勃勃的国防文艺运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开展了国防戏剧、诗歌、音乐活动。北平、天津等地有九个文艺团体联合组成了“北平文艺协会”，之后又成立了“北平作家协会”（有会员九十人），还成立了一百三十余人参加的“北平文艺青年协会”。“协会”发表宣言，号召“团结全国文艺青年从事国防文艺建设”，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去作救亡的文化工作”。在十来个文艺报刊上讨论了“国防文学”问题。

全国各地的诗歌团体，发表了“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宣言”。发起者有天津的草原诗歌会，北平的黄河诗歌会，青岛的诗歌出版社，广州的诗歌生活社，上海的联合诗歌杂志社，大声疾呼诗歌作者“联合起来”，“为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写作“国防诗歌”。仅一九三六年全国出版的诗刊就达三十余种。

国防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走私》等剧，在救亡运动中的普遍演出；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响彻全

国，大大推动了在工人、学生、市民中的国防戏剧和国防音乐活动，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所没有的群众文艺运动。

国防文艺活动还远远影响到新加坡，以及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去。

上海是革命文化的中心，国防文艺活动更加蓬勃发展，并且成立了文艺家协会，有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洪深、郑伯奇、欧阳予倩、郑振铎、谢冰心、白薇、臧克家、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宋云彬、李健吾、立波、沙汀、艾芜、叶紫、任白戈等共一百一十一人参加。并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表示“坚决拥护民族救国战线最低限度的基本的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还“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我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鲜明地标志着这是一个文艺界以左翼作家为中心，联合民主的及各派中间作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

许多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在政治宣言上签名的作家，参加了文艺家协会，在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有些作家还同时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

之后，尽管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但经过论争，显然克服了理论工作中某些缺点、错误，理论水平是提高了，明确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联系这些实际来看，“国防文学”的口号是符合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的策略原则的，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扩大了作家的团结面，开展了救亡运动中的群众文艺活动，活跃了创作，大部分创作对抗日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提高了

理论水平。实践证明，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它的主流。“四人帮”把这个蓬蓬勃勃的国防文艺运动诬蔑为“卖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的”，什么“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道道地地的国民党文学”，正好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

三

在这里，谈谈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和问题。

一九三六年四月，党中央派遣冯雪峰同志从陕北到上海，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而他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电台，加强和中央的联系，因为上海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中心。

冯雪峰过去曾经是“左联”的领导人，与鲁迅熟识，他到了上海，首先找到鲁迅，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精神，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他在相当一个时间，没有找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联系。

这时，“国防文学”口号已经正式提出，并已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尽管在解释这个口号时，有的文章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观点。

冯雪峰作为中央派到上海的一个负责同志，明明知道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紧跟党的政策，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发生极大的影响，就应按照党的原则，采取正确对待的态度：一要积极帮助地下党纠正少数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另一面也要积极帮助对“国防文学”有不同意见的作家们，加强团结，促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

可是，冯雪峰既不仔细倾听地下党同志的意见，又撇开党领

导下的许多左翼文艺家，更没有报告请示中央，又擅自向鲁迅建议，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如果认为对“国防文学”的解释有些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对左翼作家还须有一个更明确的口号，提出一个新口号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胡风先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提出新的口号，对新的口号有些观点又解释不清，对“国防文学”更只字不提，加以抹杀，于是，挑起了一场争论。

又由于在争论中，有少数同志存在着宗派情绪与片面性，这场争论更加复杂化。

之后，在争论中，一方面由于鲁迅先后发表了文章，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有了明确的解释，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要求把“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要求把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鲁迅还认为这个口号主要是对左翼作家提倡的，“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吧”。同时他肯定并没有把两个口号看成“两家”，还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另一方面，主张“国防文学”的同志，由于不能经常直接得到中央的指示，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学习条件差，理论水平不高，因而，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对于党的策略和政策的变化，可能理解不深，吃不透，对某些问题的解释、认识都不够，也难免产生某些缺点和错误。

我个人认为，重要的缺点和错误是：

一、尽管有各种因素，如鲁迅患病，有胡风对左翼内部团结

的影响等，如果在正式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之前，尽可能争取多和鲁迅商量，多征求他的意见，并在左翼文艺界内部较广泛地征求意见，多作酝酿，交换意见，在取得比较统一的意见时，再正式提出口号，发表文章解释口号时，观点也比较一致，情况也就好得多。自然，当时在白色恐怖下，聚会条件较困难。现在看来，正式提出口号之前，思想准备工作是做得不够的。

二、在鲁迅以及部分左翼作家、进步作家还不能同意参加文艺家协会之前，文艺家协会尽管已经团结了较广大的作家，为了照顾大局，还可以再等待一下，暂缓成立。

三、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方面，特别是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上，有少数文章的观点，确有右倾思想的错误。如认为不必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免吓跑了资产阶级；联合战线要共同领导，不必强调谁领导谁等。

四、“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提出之后，也有些左翼和进步作家表示赞同。特别是在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明确表示他主张这个口号，同时又承认“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有必要存在的条件下，有的同志仍然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不加具体分析，予以反对，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尤其是徐懋庸个人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许多观点也是错误的，导致了两个口号的争论更加尖锐、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团结。

我个人亲身经历过两件事可以证明，对徐懋庸这种个人行为，左联的同志是认真、严肃对待的。

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徐懋庸当即从他家乡赶回上海。他见到我时，我也曾经严肃地批评过他，认为他不和大家商量，写这封信给鲁迅，使得争论更加复杂化，不利于团结，造